

評 Mark Edward Lewis,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21 pp.

胡川安*

古代中國(Early China)在英語漢學界的發展，上限主要從文字出現的商代開始，下限大約至東漢中晚期。1970 年在北美成立的古代中國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由吉德煒(David Keightley)教授發起，目前該學會約有三百多位專家，除了歷史學家，還包括藝術史、考古和古文字學家，其所出版的刊物《古代中國》(*Early China*)可以一窺 40 年來英語漢學界對漢代及其以前中國史研究的發展概況。

此外，西方漢學界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也採集體著作方式完成通史性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兩本書分別是：1986 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史·秦漢篇》，¹及 1999 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古代史》²。2000 年

* McGill University 東亞系博士班研究生

¹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I: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²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s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之後，隨著西方史學界對比較古代史的興趣日益升高，學者也將秦漢史納入他們的視野之中，其中兩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分別是：2001年出版的《帝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視野》，³由葉山(Robin D. S. Yates)教授撰寫秦帝國，⁴湯瑪斯·巴斐德(Thomas Barfield)教授撰寫匈奴帝國；⁵2009年由華爾特·雪戴爾(Walter Scheidel)教授任召集人，編寫的《羅馬與中國——比較視野中的古代世界帝國》。⁶

採用集體著書的原因在於，近幾十年所發表的新材料太多，諸如甲骨文、青銅銘文、秦漢簡牘、帛書和大量的物質文化遺存。新出土的史料在現行學科分類中又被劃分為歷史學、考古學、哲學、文字學和美術史，沒有單一學者可能精通如此龐雜的材料和跨越這麼多的學科，故集體著書有其策略上與現實上的考量。如2010年戴梅可(Michael Nylan)和魯惟一(Michael Loewe)主編的《中國早期帝國——一個重新的評價》，便召集不同專門的學者，針對近來所發現的材料，從歷史、考古、科學、宗教和文學等不同角度重新評價秦漢帝國。⁷

³ Susan E. Alock, Terence N. D'Altroy, Kathleen D. Morrison, and Carla M. Sinopoli eds., *Empires: Perspectives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⁴ Thomas J. Barfield, "The Shadow Empires: 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along the Chinese-Nomad Frontier," in Susan E. Alock and et al. eds., *Empire: Perspective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41.

⁵ Robin D. S. Yates, "Cosmos, Central Authority, and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 in Susan E. Alock and et al. eds., *Empire: Perspective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pp. 351-368.

⁶ Walter Scheidel ed., *Rome and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⁷ Michael Loewe and Michael Nylan eds., *China's Early Empires: A Re-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然而，集體編撰雖然涵蓋的層面較廣，卻容易出現觀點不一的問題，無法達成不同專門之間的有效對話。畢竟學者來自歐美不同的漢學背景，關心的方向也不同，很難整合出一個特定的想法，只好各陳己見。例如《劍橋中國上古史》中，商和西周分別劃分成考古學與歷史學，由不同學者撰寫，但面對同一研究時段，學者的論述卻時有牴觸，編輯只好以多說並列方式呈現，導致整本書缺乏整體而一貫的觀點。

在這一背景下，魯威儀(Mark Edward Lewis)在2007年出版的《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是由卜正民(Timothy Brook)編輯，哈佛大學Belknap出版社所出版「帝制中國歷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叢書的第一本。本書觀點特具，從書名即可得知作者想表達在中國歷史上，最先出現的秦和漢兩個帝國在整個帝制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就魯威儀看來，秦漢帝國是中國的「古典」(Classic)時代，如同希臘羅馬時代在西方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樣。他在導論中指出了秦漢帝國的五個特色，分別是：(1)秦漢帝國轄下的區域特色並沒有被帝國的新秩序所取代，各個區域仍然維持自身的特色；(2)政治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之身；(3)文字的統一；(4)中國內部的非武裝化，軍事活動轉變為針對邊疆地區；(5)豪族在鄉村的發展，並且成為農村與中央權力的聯結。

本書在導論與結論之外共分十章，分別是地理、為了戰爭而組成的國家(A state organized for war)、帝國的矛盾(The Paradoxes of Empire)、帝國城市、鄉村社會、外在世界、親屬組織、宗教、文學和法律。書後則附有作者選擇的重要史事年表，與全書所提及的重點相互呼應。各章摘要如下。

第一章分析秦漢時期的地理與當時文化的關係，作者討論了水文、地景與氣候等相關問題。由於中國本部多山的地形，造成不同的

水文與地理區，也形塑戰國不同國家的特色。魯威儀除了從自然地形，也從文化地理加以論述，並透過當時遺留的文字探討當時論者對不同地區人群、屬性和文化習慣的看法。關東與關西之間的對抗、衝突是戰國到秦漢時代歷史發展很重要的一部分，東漢從長安遷都洛陽，象徵著尚武的關中走向文治的關東，也代表了儒家的勝利(triumph of Confucianism)。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綜合性討論，第二章分析秦之所以統一天下與崩潰的理由；第三章則討論繼承秦的漢帝國如何在秦的基礎上因革損益。第二章以「為了戰爭而組成的國家」為標題，點出秦如何統一天下。商鞅變法的改革重點主要有三：(1)擴充軍隊的規模；(2)透過土地改革將之分給同時是農民的軍人，以增加稅基；(3)在全民皆兵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行政機構。透過這一連串系統化的改革，使秦國成為一個以戰爭為基礎的國家，並將權力集中在統治者手中。秦帝國不但統治了當時的世界，皇帝也同時成為人間的統治者，和人與天的溝通者；在新世界的建設上，秦又嘗試集中與劃一當時的文字、度量衡、錢幣和法律。

由於秦迅速地崩潰，第三章接著討論漢帝國在繼承秦的遺產同時，如何逐漸改變秦的政策，包括：(1)放棄全民皆兵政策，以減少人民的大規模動員；(2)由國家支持藝術和文學，並提高經學的地位；(3)將土地資源、地方勢力和國家行政結合，不再依賴小農，而是仰賴於擁有土地的豪族支持。

第四、五章討論城市與鄉村生活。在城市中，從戰國時代開始，象徵統治者權力的建築大量出現。希臘和羅馬文化中，統治者必須藉演說、辯論在公眾場合展示權力；在中國，統治者展示權力的方式則是從眾人的視野中消失。都城的建設象徵了一個朝代，城市格局、城牆和城市規劃也都展現了人為加諸自然世界的改造。根據考

古發掘，漢長安和洛陽的資料比起以前更為增加，有關其中布局的瞭解也越加深入。

雖然秦漢時期大部分的人都居住在鄉村，然而他們幾乎被歷史遺忘，第五章因此接著討論居住在鄉村的群眾。這是以往歷史學家較少關注的部分，作者從文獻和最近出土的考古材料想像當時的農村生活。從農業工具來看，由於新式農具的引進，小農們必須合作以增加農作，同時也促成了土地的兼併與掌控土地大族的出現。豪族間的彼此串聯，則成為東漢歷史的重要發展。

第六章剖析秦漢帝國與外在世界的往來。秦漢帝國由於統一在單一政體下，加強了「中國」的認同。關於游牧民族的興起，魯威儀採用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看法，認為中國北方邊界的族群，本來並沒有農業與游牧之別，然而生活於生態經濟不穩定的地區，當氣候發生變異，產生危機時，促成人民以武裝方式奪取資源。漢與匈奴間的和戰，耗費了漢政府的大量資源與人力。最後，漢取得了勝利，匈奴分裂，南匈奴定居於鄂爾多斯地區。

第七章考察西漢的親屬(kinship)組織。作者認為，秦漢的父系組織與家戶組織間存在著緊張性，秦漢的父系組織是透過父傳子；相對地，家戶的組織主要是透過夫妻，然後才是父子關係。在此結構中，妻透過母親的角色取得權力。其次，魯威儀也討論性別與空間的關係。他指出，男女之別的概念也存在於社會與家庭當中的空間。此外，親屬關係結構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在於對於祖先的記憶與儀式上的保存，當祖先逝去之後，祂的靈魂接受祭祀，然後在一代代祭祀儀式之中逐漸消逝，這個過程是一種「結構性的失憶」(structured amnesia)。

第八章討論秦漢帝國的宗教，魯威儀認為中國人提供犧牲給等同於人間的另一精神世界，溝通看得見(visible)與看不見的(invisible)兩個世界的地方就是墓祠。秦漢時代，人們無所不祭，也相信各式各樣

的讖緯。在國家祭典上，秦始皇祭祀各個方向，每個不同的方向代表著不同的顏色與德性，並且封禪名山；至漢，武帝又開始祭拜太一神與后土。漢代的人事死如生，將死後的墳墓布置的如同生前的居所；但同時又視死者是一種威脅，生與死象徵著秩序與混亂。

第九章討論秦漢的文學。作者採取「文學」的廣義，從經典與「儒」的定義談起，將儒視為懂六經並且為之作傳的專家。除了儒家經典，百科全書、史書和漢賦，也都是文學的一部分。《呂氏春秋》和《淮南子》這兩部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他們的作者嘗試找到自然的模式與規律，並且藉此建立一種人間世界的權威。在歷史的寫作上也是如此，《史記》嘗試透過書寫展示帝國。在漢賦的書寫上，司馬相如的賦呈現了一種無所不包的企圖。而在劉歆等人編撰的圖書目錄中，則設想了對於知識一統的理想。透過不同的書寫，各種文類呈現帝國的不同面相，在新的帝國中展現出統一的秩序。

法律在秦漢帝國生活的不同層面都相當重要，第十章中，魯威儀認為法律不僅是統治與懲罰的系統，也是親屬結構的延伸，連結了宗教世界。法律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語言，和對於人民的規範。《日書》與法律文書同時出現於墓葬，反映秦漢法律仍與宗教息息相關。雖然宗教的概念仍存在法律之中，但它依舊是一種行政和保障社會秩序的工具，是關於行為的規範與懲罰。

在結論中，作者提到漢帝國衰落與崩潰的原因。在外，隨著匈奴分裂，南匈奴成為東漢邊境上的屬國，東漢政府並透過他們加強邊疆的防衛。然而，邊境的人口依然持續下降，以至無法應付後來的羌亂。在內，東漢政府為了內部安全而取消全民皆兵制度，但隨後的發展改變了這個情況。由於刺史長期任職，使得軍隊逐漸私有化，這些軍隊又掌控於大族手中。中央的權力逐漸陷入外戚與宦官的手中，皇室逐漸與掌握地方權力的大族背離，喪失對整個國家的控制。

過去以西方讀者為取向的秦漢通史性著作，包括 1968 年魯惟一出版《早期帝制中國的日常生活》，⁸該書雖然包羅秦漢生活的不同層面，惟當時的材料不如現在豐富。1983 年王仲殊的《漢文明》，以考古與物質材料為主。⁹2007 年張春樹的《中華帝國的興起》，則以軍事、邊疆關係與帝國興起間的關係為主，使用的材料也侷限於傳統的史書和邊疆地區所出的簡牘，並未涉及其他生活層面。¹⁰魯威儀能以一人之力，結合文獻材料與考古出土實物，寫下這本具有觀點的秦漢通史，實屬不易。然而，本書仍然有些缺點值得商榷。

其一，讀完本書，讀者不免好奇，作者對帝國的定義是什麼？作者指出，秦漢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古典時代，顯然有意與希臘羅馬時代比較；然而，中國古典時代的特質是甚麼？中國的古典時代對於帝制中國的影響何在？再者，作者也沒有回答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即秦漢帝國與西方 Empire 之間的差異何在？

其二，本書以不同的主題分別討論秦漢帝國的各個層面，而不是以編年作為敘事主軸，這樣的寫作方法優點在於能夠深入討論每一個主題，舉例來說，作者在第五章討論鄉村社會，便以人類學的概念探討鄉村社會中的社會網絡與父系組織，這是以往學者較少關心的部分。然而，這樣的書寫方式卻易使本書過度偏重結構，而將秦漢帝國視為靜態且同質性的整體，以致無法呈現歷史動態且變化的一面；並使讀者誤以為秦漢的城市、鄉村、文學、宗教與法律在數

⁸ Michael Loewe, *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London: Batsford; Putnam, 1968).

⁹ Wang Zhongshu, *Han Civiliza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¹⁰ Chang Chun-shu,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National, State, and Imperialism, ca. 1600 B.C.—A.D. 8*;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Frontier, Immigration, and Empire in Han China, 130 B.C.—A.D. 157* (Ann H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百年歷史過程的發展中缺乏變化。

其三，本書除了缺乏歷史動態的思考，也罕見在區域與地方特殊性上著墨。按照作者的想法，本書是依據五個主軸加以論述，其中之一即是秦漢帝國下的區域特殊性。然而，作者除在第一章導論之中分析了關中與關東在秦漢帝國之中的重要性，其後的章節便對區域的特殊性鮮少著墨，即便第四章曾討論秦漢的都市，但讀者所知也僅限長安與洛陽，其他地區性的大都市則付之闕如。我們知道，秦漢帝國沿續戰國時代各國間的差異，當時的人互不相屬、文化有別，又說著不同的語言。¹¹即使至西漢，戰國時期各個不同地區的物質文化與認同仍然頑強地存在於各個不同地區，¹²更何況居住於帝國邊緣的巴、蜀，¹³或是南方百越等地的族群。然而，作者對於這些複雜的區域文化都沒有提及，更未說明秦漢社會如何與這些族群與地域文化互動的過程。

總之，魯威儀這本秦漢通史性著作，為西方讀者理解秦漢帝國提供了一扇窗子，不同於《劍橋中國史·秦漢篇》將近千頁、由眾人集體著作的百科全書，本書具有自身新穎的觀點、流暢易讀的英文，其貢獻無庸置疑。然而，本書仍需針對帝國定義的問題、動態的歷史呈現與區域文化特殊性的問題更加深入探討。

(本文於 2011 年 12 月 5 日收稿，2012 年 1 月 9 日通過刊登)

¹¹ Robin D. S. Yates, "Cosmos, Central Authority, and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 in Susan E. Alock and et al. eds., *Empire: Perspective from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pp. 358-359.

¹² 俞偉超，〈考古學中的漢文化問題〉，收入《考古——文明與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頁 51-52。

¹³ 胡川安，〈由成都平原看中國古代從多元走向一統的過程〉（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